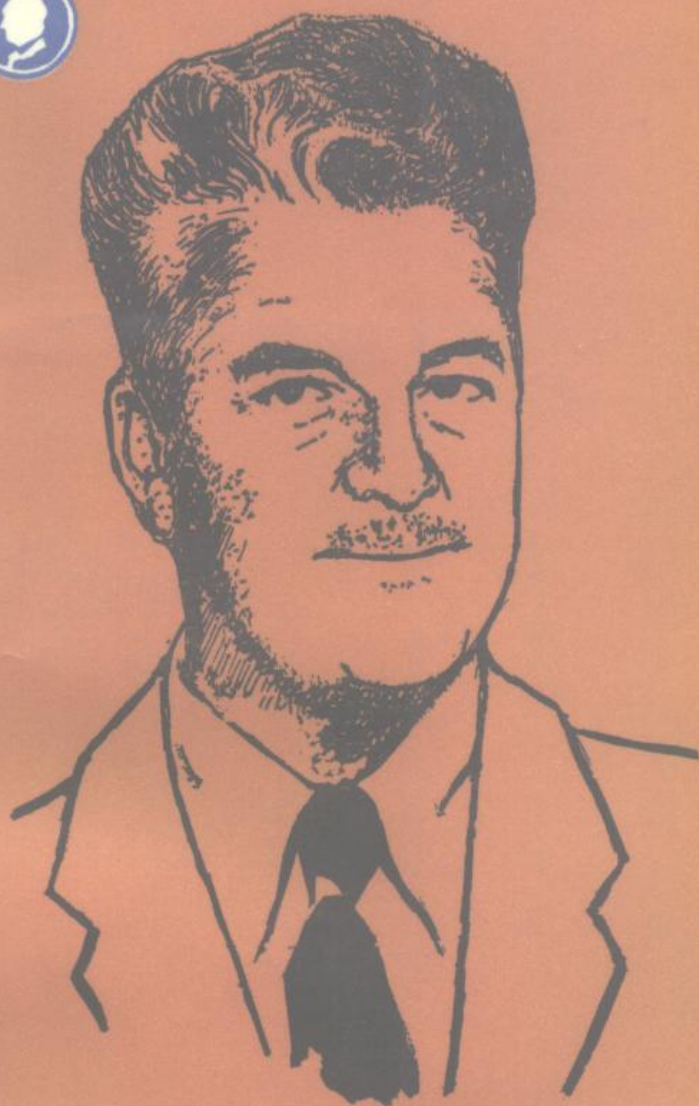


尤金·丹尼斯的一生



〔美〕佩吉·丹尼斯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美〕佩吉·丹尼斯 著

尤金·丹尼斯的一生

劳远回 童一秀 译

新华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
A Personal View of A Political Life

1925—1975

By Peggy Dennis

Published by Creative Arts Book Company (Berkeley,
California) and Lawrence Hill & Company (Westport,
Connecticut), U.S.A.

First U.S. Edition, October, 1977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创造文艺书籍出版公司与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劳伦斯·希尔公司1977年联合出版的版本译出。

尤金·丹尼斯的一生

〔美〕佩吉·丹尼斯 著

劳远回 童一秀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插图2张 240,000字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7-5011-0126-4/K·25

统一书号：11203·093 定价：3.10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原名为《一个美国共产党人的自传——五十年政治生涯的回顾(1925至1975年)》，作者是已故美共领导人尤金·丹尼斯的夫人佩吉·丹尼斯。作者说明，这是他们夫妇两人的传记。她以大部分篇幅介绍尤金·丹尼斯的事迹以及美共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批判白劳德错误的详细经过)，其中有些是过去未见发表过的。作者还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对丹尼斯等人的残酷迫害以及后者的英勇斗争。

尤金·丹尼斯是美共杰出的领导人之一，20年代入党，从1938年至1961年病逝期间，先后任中央书记、总书记和主席。本书介绍了以下情况：

他对敌斗争坚决，在敌人法庭上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30年代初，他因组织工人斗争被捕后在法庭上说：“成百、成千的人将把这个斗争继续下去，直到这个制度被废除，无产阶级专政被建立。”麦卡锡主义时期，他主动到非美活动委员会去作证，反对宣布美共为非法。他在法庭上指责非美活动委员会是“亲法西斯的工具”，其存在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为此他被判刑一年。当局又以“违反史密斯法”罪判处

他五年徒刑。他在法庭上宣布：“共产主义运动是任何法庭和立法机构都无法扼杀的，不管他们采用武力或任何其他强制手段。”被判刑后，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在国内斗争。

丹尼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与此同时，他多次提出共产党人要认真研究本国情况，认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扎根于美国经验之中。1956年他提出，美共不应再象过去那样“机械地”、“教条主义地”“把别国党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经验”，而应对本国情况进行扎扎实实的、客观的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制订政策和策略。他不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应当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新情况和新的理论概念。

丹尼斯注意政策和策略，引导党员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怎么办》等文，提出共产党人应当到改良主义组织等现存的团体中去进行经常的工作，要利用一切机会去争取大量同盟者。麦卡锡主义时期，他反对美共全部转入地下，主张利用一切尚可利用的合法条件进行斗争。他在法庭上注意提出广大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争取到大批律师和其他人的同情。他向党员指出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丹尼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赫鲁晓夫访美时在他面前指责中国党犯了错误，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中国同志的内部事务”，应当由中国党自己解决。

丹尼斯30年代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提出过一些好的主张。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南非时，建议南非共产党首先应成为土著黑人工人的党，但应克服一些“左”的作法，不要

对受种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白人党员采取惩罚性措施，而应多做工作，不要鼓励黑人扔掉通行证。他作为共产国际顾问小组成员来华时，参加过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会议，也去过苏区。他主张认真研究中国情况和中国党的经验。他向夫人表示他支持苏区同志的看法，不同意把“事先画好的蓝图”带到中国来。他曾写报告给共产国际，对顾问小组在华的工作提出意见。白劳德与福斯特在如何对待罗斯福新政的问题上有分歧，季米特洛夫于1938年派丹尼斯回国工作，要他在白劳德的改良主义倾向和福斯特的宗派主义倾向之间起“平衡作用”。

作者也指出了丹尼斯的一些弱点和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如：当美共与罗斯福政府合作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时，美共曾错误地解散工厂支部和产联所在各工业部门中的党组，使党的工作受到削弱；苏德条约签订后，美共错误地停止了反法西斯斗争。丹尼斯和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同意了上述这些主张。50年代丹在狱中认真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出狱后于1956年提出党应在“社会主义原则和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从过去可能犯过的策略上、甚至理论上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再“教条主义地”照搬别国的经验。

丹夫人也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曾任美共州委委员和共产国际交通员，并长期在丹尼斯身边工作。50年代丹尼斯坐牢时，她任“史密斯法受害者家属委员会”主席，积极参加营救活动。丹去世后，她任地方党报记者。她在不少问题上不同意美共中央的观点，如：她反对美共支持约翰逊政

府，主张美共摆脱苏共霸权，反对与中国决裂，反对苏联侵捷，主张支持国内群众运动，因此而受到美共领导的打击，于1976年公开声明退出美共。

本书的一个缺点是，作者对福斯特的介绍有较大的片面性和偏激情绪。她虽然肯定福斯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对这些贡献写得不够具体，而对他的缺点却写得很多。此外，作者说1955年至1960年美共党内的斗争是“党内大多数人既反对盖茨集团的修正主义、也反对福斯特集团的宗派主义的斗争”，不恰当地把福斯特的错误与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盖茨的错误相提并论。这一提法也不符合本书中所引用的尤金·丹尼斯对福斯特的看法。

译者对书中某些无关紧要的段落作了些删节。

附：丹尼斯简历

1931——1935年 在共产国际远东处工作

1936年 当选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

1937——1938年 任美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 当选美共书记处书记

1946年 当选美共总书记

1951——1955年 坐牢

1957年 重新当选美共总书记

1959年 当选美共主席

1961年 病逝

序

在本书中，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没有从理论上或哲学上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或辩护。这是两个政治阅历颇深的人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一篇有关政治或经济理论的论文。

然而，如果人们不了解我丈夫尤金和我是怎样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献给了取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整套经济、社会和政治观点并且奉献给了共产党（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实现这一信仰的唯一可行的途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一生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我们曾经允许对我们发生的各种事情。

从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起（我丈夫21岁时在西雅图入党，我16岁时在洛杉矶入党），而且在以后共同生活的33年的时间里，尤金和我都是职业革命者，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奉献给了运动和党的需要和要求（真实的和想象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变成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尤金在党的地方组织和全国机构里以及在国际上迅速地上升到领导地位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又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党所解释的历史——背景下存在的。从莫斯科到上海到纽约，

情况无不如此。

虽然本书没有提供资料来源和注释，但是在叙述中所涉及的一切事实和事件都已经过核实，方法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威斯康星大学和威斯康星州立历史学会（均在麦迪逊）的图书馆和档案室，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市立图书馆以及在美国民权同盟和社会学图书馆的办公室（均在洛杉矶）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还阅读了几百本与本书所涉及的50年期间的政治与经济事件有关的书籍。这些书籍对这些事件作出了不同的分析。本书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则完全是我自己作出的。

历时一年的研究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帮助我回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另一个目的是使我生动地回想起自己当时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书中所提到的情景和对话就是根据这些回忆整理的。

我丈夫的观点对于美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从而也对于我们的个人生活，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本书谈到的这些观点都是根据他本人所写的丰富的文字材料——报告，讲话，小册子，文章——而写成的；此外，我阅读了尤金写给某些人的私人信件，这些信是收信人在尤金去世后交给我的；我还在尤金留下的很少几份卷宗里找到了他在一些纸张的页边空白处随手写下的评语；33年的共同生活、交谈以及往往是激烈的争论，尤其使我对他有深入的了解。如同往常一样，我在书中提到仅仅属于我自己的个人看法时，都明确地作了说明。

最后一章《一个单枪匹马的妇女》把1961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的情况压缩得太简单了。我和其他人一样清楚地懂得，这16年事态万千、错综复杂，理应成为一整本新书的主题。然而，我在这一章中只是概括地叙述了一下，以说明当时我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怎样迫使我在新的条件下作出了和我过去的情况相比是相当强烈的反应。

——佩吉·丹尼斯

1977年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目 录

第一章 开端..... (1)

家庭背景——尤金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联系——入党——尤金同我相见——职业革命者

第二章 经受考验..... (27)

1929年至1931年——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罢工——失业者斗争——组织工会的工作——逮捕与审问——地下活动——逃亡者——革命战士——蒂姆的出世

第三章 放眼世界..... (59)

1931年至1935年——在莫斯科的生活——共产国际——尤金的旅行：南非，菲律宾，中国——我的工作：外籍儿童学校——红色工会国际——列宁学校——欧洲与亚洲之行

第四章 回国扎根..... (98)

1935年至1937年——回到美国——蒂姆留在莫斯科——威斯康星

DB 11

州的党组织——人民阵线——建立产联——支援西班牙

第五章 再次去莫斯科，而不是去马德里 …………… (128)

1937年至1938年——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的清洗——白
劳德和福斯特在莫斯科——尤金夹在中间——回家

第六章 从上面俯视下方 …………… (147)

1938年至1940年——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生活——统一战线——希
特勒—斯大林条约——与新政联盟决裂——再次转入地下

第七章 世界处于大战之中 …………… (165)

1941年至1944年——战时的莫斯科——战时的纽约——小尤金的
出世——全国团结政策——成绩与错误

第八章 白劳德的梦想，杜鲁门梦魇 …………… (194)

1945年至1950年——改良主义政策——白劳德被开除出党——尤
金担任总书记——问题与争论——冷战政策——众议院非美活动
委员会——按照史密斯法进行的审判

第九章 政治犯和犯人的妻子 …………… (231)

1950年至1955年——监狱——地下状态与挣扎前进——麦卡锡时
期——写作与旅行

第十章 没有解决的危机 …………… (283)

1956年至1959年——出狱——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内部危机

——看法与分析——政治巩固

第十一章 最后的一年 (313)

1960年——尤金的病——同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在一起的一个夜晚——和蒂姆相会——疏远——尤金的去世

第十二章 一个单枪匹马的妇女 (340)

1961年至1976年——影响与观点的改变——小尤金——外事编辑——在社会主义世界里的旅行——运动中的分歧——最后的分析——新的看法

第一章 开 端

我们是坐小汽车、公共汽车或沿途搭乘他人的车从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各个大小城镇来到这里的。我们54个人准备在伍德兰德城外5英里、位于波特兰和西雅图之间的芬兰裔居民合作社的一个会议室里住6个月。这栋白色的房子很象一个仓库。它屹立在圆丘上，俯视着结了冰的刘易斯河，周围是平坦的农田和茂密的树林。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休假胜地。然而，我们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来到这里的。

那是1928年6月23日。太平洋海岸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夏令学校在这一天开学。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是在到校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都有点自豪地意识到，我们所属的委员会派我们到这里来学习，给了我们多么大的荣誉和责任。

学员的年龄在15岁到30岁之间。我是随旧金山的一小批人来到这里的。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来了一大批人。我和他们热情地拥抱。我们彼此很熟悉，过去曾经在一起参加共产主义儿童组织和青年运动，并且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加入美国

共产党。只有一位洛杉矶人我不大熟悉。我有些拘谨地向他打了招呼。我之所以拘谨，还因为他不是一位学员，而是5位老师之一。

1947年，联邦调查局称他为一个“曾经用过许多别名的人”，其中一个名字就是尤金·丹尼斯。1927年，这位当时名叫弗兰克·沃尔德伦的人来到了洛杉矶。不久，我的丈夫比尔和我被党派到旧金山工作。当时我刚18岁，结婚不久。

我们女生住在顶楼里。过了熄灯时间，我和其他学员们还在说话。我们对于那位沉默寡言、十分谦逊、经常参加我们活动的校长奥利弗·卡尔森十分尊敬。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在几位老师当中，最使人感到鼓舞、最令人满意的还是尤金（当时叫弗兰克）。而且我们的赞许，并不仅仅指他的学术水平。

尤金说话幽默，富有风趣，没有陈词滥调和党八股。这一点与我过去见到过的党的干部不同。我到伍德兰德来时，已经是一个脱产的年轻共产党员了。我曾多次发表讲演，谈到马克思、列宁和世界革命。1928年夏天，我在尤金所开设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力量”这一课的课堂上，学到了过去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的对于我国历史的一种解释和态度。

年仅23岁、入党刚刚两年的尤金，要我们好好继承本国的革命传统，不要把这部丰富的历史拱手送给那些摇旗呐喊的“超爱国主义者”，任凭他们去歪曲。当时我们党对于德国和俄国的经验怀着敬畏的心情，处处照搬，并且以此作为本国党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当时的情况下，尤金居然在课堂

上向我们指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应当扎根于美国的经验之中，应当建立在美国文化这块土壤上，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作风上，他也不同于过去我见过的那些党员干部。他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用提问的方式来启发我们。在课外时间里，当我们的学习小组分散地坐在树底下，在田野里晒太阳，或者坐在河边的岩石上时，他常常来到我们中间。他伸着腿躺在地上，嘴里衔着一根草或者一个细长的烟斗，细心倾听我们的讨论。当有人要求他提供“正确”的答案时，他往往反过来向这个人提出问题。

我们在这里的课堂上学习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劳工新闻学。尤金教我们美国历史。课余时间，我们总是组织体育活动、文艺表演、宣传鼓动的戏剧和周末舞会，并邀请芬兰裔房东参加。他们也是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有的是伐木工人，有的是编制木板房顶工人工会和渔民工会的会员。

我们分成一些小组到波特兰和西雅图去在工会会议上讲话，呼吁人们支持西南部矿工的罢工和东部纺织工人的罢工。每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在伍德兰德市公园里站在肥皂箱上发表讲演，谈我们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在头几周里，发生了两件令人难忘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巧妙地进入了一个后备役军官训练营的营地去散发传单。另一件事情是，城里一批暴徒闯入了我们的学校，扬言要彻底消灭“这些共产党王八蛋”、“犹太鬼”和“主张自

由恋爱的娼妇”。

在我们学习劳工新闻学的课堂上，我们起草了一份传单来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活动，呼吁后备役军人“放下武器”。在我们学习共产党组织原则的课堂上，我们讨论如何设法去接近后备役军官训练营里面的青年男子。我们当中的一批女孩子穿上了大家凑起来的最漂亮的衣裳去出席军营里的一次舞会。我们假装风骚、热情地同他们跳舞，尽管在这么多穿着制服的青年男子面前，我们感到很别扭。按照事先制订好的计划，在指定的时刻传单突然在空中象雨点般地撒了下来。这些青年男子显然以为这是那天晚上的娱乐活动的一部分，争先恐后地去抢传单。我们趁机迅速退出会场，钻进了早已等候在路边的小汽车。两个面红耳赤、佩戴金星肩章的军官抓住了我们当中的两个人进行盘问。这两个人守口如瓶，不回答问题。这些军官们也不愿让这件事走漏风声，便放我们走了。回到学校后，我们感到自己胜利了。我们深入虎穴去打了虎，现在一心希望军营里的那些青年当中的某些人正在阅读我们散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吁书。

伍德兰德的友人带来消息说，他们在城里听说，有人扬言要来捣毁我们的学校。于是我们在上午举行的例会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课也没法上了。也许沙俄时期的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也不曾象我们在那个夏天的早上那样认真地辩论过改良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人主张站起来进行斗争，另一部分人则认为